工农兵写作教学的“常青经验”及其历史展开

张宝元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向文化进军”的背景下，常青创造的工农兵写作教学法“速成写作法”以“我写我”为核心，通过破除“三关十怕”使工农兵从“不敢写”转变为书写主体，因而对军队文化教育具有重大贡献而被授予“特等功”，并从部队推广至全国扫盲实践，成为工农兵写作教学的典型经验。“速成写作法”在“提高”上存在局限，常青此后转向“工农兵阅读法”以弥补短板，以常青经验为缩影考察“十七年”工农兵写作教育可以发现工农兵写作教育的“双轨制”，“常青经验”更重于培育广泛的“文化积极分子”。1965 年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的召开即是对“常青经验”成绩的最终检验与历史展开。

关键词：工农兵写作；常青；速成写作教学法；“我写我”；向文化进军

The “ Evergreen Experience” of Worker-Peasant-Soldier Writing Instruction and Its Historical Unfolding

Zhang Baoyuan

Abstract: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marching toward culture,” the worker-peasant-soldier writing pedagogy created by Chang Qing—the “rapid writing method”—took “I write myself ” as its core. By breaking down the “three barriers and ten fears,” it enabled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to transform from “not daring to write” into writing subjects. As a result, it made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military cultural education, was awarded a “special-class merit,” and was promoted from the military to literacy campaigns nationwide, becoming a model experience in worker-peasant-soldier writing instruction. The “rapid writing method” had limitations in “improvement,” and Chang Qing subsequently turned to the “worker-peasant-soldier reading method” to make up for its shortcomings. Taking the Chang Qing experience as a microcosm to examine worker-peasant-soldier writing education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reveals a “dual-track system” in such education, with the “Chang Qing experience” placing greater emphasis on cultivating a broad range of “cultural activists.” The convening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Young Amateur Literary Creation Activists in 1965 was the final test and historical unfolding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Chang Qing experience.”

Keywords: worker-peasant-soldier writing; Chang Qing; rapid writing pedagogy; “I write myself;” marching toward culture

引言

1952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同日连发三道“嘉奖令”[①]，授予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政治文化教育助理员常青晋“正连级”、记“特等功”、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奖状”三项荣誉，以嘉奖他所创造的“速成写作教学法”[②]。军队记功分为战斗功勋和平时功勋[③]，此时正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战时，平时功勋在认定上比战斗功勋的裁定要更加严格，为什么常青能够通过创造“速成写作法”而荣获“特等功”，不妨参看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功与奖励工作条例（草案）》，获平时功勋中“特等功”的评选条件为：

1. 凡在完成艰巨的工作任务中，创有特殊功绩，并在部队工作上起有巨大推动作用者。

2. 凡在经常工作中，成绩一贯突出，对某项工作有特殊贡献者。

3. 凡在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及各种技术等某一方面，有卓越的发明创造，对国防建设有特殊贡献者。[④]

对照条例不难看出，常青“速成写作法”的“发明”无疑在当时被认为是为部队完成了一项“艰巨”任务，乃至在“国防建设”上也可以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常青的嘉奖令中也明确指出：“速成写作法”这一方法“解决了工农兵在速成识字后写作上的困难，对目前全军的文化教育有重大的贡献和意义。”[⑤]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功勋评价体系通常集中于军事与物质生产等“可量化”的领域，而在课堂中的写作教学向来是难以转化为“功绩”的。因“教写作”而被军区嘉奖为特等功，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头一次，足以体现常青“速成写作法”在新中国写作教育史上的重要性。我们不禁追问：常青的“速成写作法”何以有着“特等功”的重量？这一写作方法从部队进一步推广到全国的过程中，对工农兵写作又发挥着怎样作用？

关于工农兵写作，既有研究多从扫盲运动或工农兵作家的作品等角度展开讨论，对工农兵写作的开始前的写作教育基础关注不多，尤其是“常青经验”仅少数学者略作提及[⑥]，较少追问工农兵何以开始真正落笔。共和国成立初期，工农兵是如何从识字到敢写？再从敢写到文艺创作？其中的具体实现是如何一点点发生的？“常青”的“速成写作法”或许是绕不开的重要“写作事件”，常青“速成写作法”这一写作教学方法是如何转化为具有制度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教育实践？以“常青经验”为视角，我们或许可以从中窥探工农兵写作的制度逻辑，方法机制及历史展开。

① 参见《华北军区通令》《华北军区政治部通令》《华北军区政治部关于奖励常青同志的决定》，华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速成写作教学法创造者——常青》，华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编印1952年版，第1—5页。

②“速成写作教学法”也多被称之为“速成写作法”或“常青速成写作法”。

③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功与奖励工作条例（草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952年1月21日）：“在某一具体事迹上，具有特殊性、创造性，超出一般水平者，即可立功；凡在某一方面或数方面做出有超群的突出功绩，无论对战斗、建设具有极大贡献，又为群众所拥护爱戴者，即可评选为英雄或模范。”总政治部组织部、西安政治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功与奖励工作条例（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奖励工作文献选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58页。

④ 总政治部组织部、西安政治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功与奖励工作条例（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奖励工作文献选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73页。

⑤ 华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速成写作教学法创造者——常青》，华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编印，1952年，第1页。

⑥ 如谢保杰在《主体、想象与表达：1949—1966年工农兵写作的历史考察》一书中对常青的“速成写作法”的介绍，参见谢保杰：《主体、想象与表达：1949—1966年工农兵写作的历史考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1—132页。

一、“速成写作法”的总结与“常青经验”的推广

工农兵写作教学在共和国之初从来不是单纯的教育方法问题，而是革命年代形成的文化政治的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处在二战后的“冷战”格局之中，因此也就自然延续了革命战争年代以来形成的文化领域中的“战争文化心理”[①]。故而工农兵的文化教育不是润物无声的渐进式工作，而成为一种追求“兵贵神速”的战略目标。早在 1944 年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毛泽东便把文化工作规定为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并认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②]。文化教育工作可以被换算为“战斗力”，这一等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仅没有松弛，反而愈发强化，而如何快速增强“战斗力”，也自然被纳入文化教育工作的考量之中。

（一）“向文化进军”与“速成”的政治

新中国成立之初，军队整体文化水平严重偏低，为改善这一状况，全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向文华进军”运动。“向文化进军”并非一句口号，而是有着严密制度设计，1950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以军委主席名义颁发《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文件明确规定全军除执行规定作战任务与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③]，要求“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④]。这一指示对文化的重视更体现在具体的时间部署比例上：“在连队的教育时间内，暂规定以百分之六十的时间进行文化教育，以百分之三十的时间进行军事教育，以百分之十的时间进行政治教育。”[⑤] 可以说，建国初期对军队的文化教育的权重甚至超过了军事训练本身。在目标设定方面，明确要求在三年之内使一般战士及初级小学程度以下干部达到高级小学水平，使高级小学程度以下干部达到初中水平，并规定此后继续提高。在方法方针上，强调“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⑥] 教育原则，强调“短平快”的同时又要求“质量”。这种“速成”与“正规”的并置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张力。

“向文化进军”首先以扫盲为核心，其代表性成果是“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的推广。在祁建华“速成识字法”之后，“向文化进军”中陆续出现了曹卫民的“速成算术教学经验”、曾端仪的“速成写字教学方法”和常青的“速成写作教学经验”[⑦] 的标志性教学法。识字、写字、算术、写作，构成了一条“向文化进军”的完整链条。而这其中，写作可谓最难攻克的一环。祁建华“速成识字法”使得部队中文盲半文盲问题得到迅速缓解，广大指战员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基础识字任务，拥有了基本的识读能力。然而，扫盲的快速推进并未自动地带来表达能力上的进一步提升，“会认字”与“会写作”之间存在巨大的能力断层，大量战士完成速成识字之后，仍无法通过写作来

① 陈思和：《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陈思和文集：新文学整体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245 页。

②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011 页。

③ 毛泽东：《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年，第 405 页。

④ 同注③。

⑤ 毛泽东：《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 406 页。

⑥ 同上书，第 407 页。

⑦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在总结部队文教成就中提到这四项教学法，并认为“这些创造对部队的文化教育作出了光辉的贡献”。参见萧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人民日报》1953 年 6 月 24 日，第 3 版。

进行流利表达，甚至不敢动笔，普遍陷入“会认不会写”与“不敢写”的困境中，如何通过写作来真正意义上巩固“向文化进军”的成果成为“燃眉之急”。

（二）“我写我”：“速成写作法”的归纳与总结

常青的写作教学正发生在“向文化进军”这一运动中。常青，原名常庆，1927年生，原籍河南栾川，1948年随着家乡解放，奔赴洛阳考入北方大学，不久，常青参加人民解放军华北随营学校学习。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随营学校改为纠察纵队，常青参与维护城市秩序，并调到连部任文书。常青文化水平较高，在军中自觉帮助战友们进行文化学习，“那时，他热情如火，夜里在大街小巷巡逻，白天在班里帮助工农出身的战友们学文化，他编的《纠察三字经》受到广大战士的欢迎，他曾因此立了两小功。”[①] 常青在工作之余，经常帮助战士们写家信，改日记，办墙报，在同战士的来往中，他深深体会到工农出身的战士热切地要求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1950年，常青到第二高级步兵学校第一大队任教育干事，他每天深入学习小组，帮助学员学习，在工作中随时随地记录材料，积累了众多的提高写作教育的方法，常青还建立了《教学素材汇编》，登记了大大小小三百多个教学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写出七本工作笔记。在“向文化进军”运动开始后，常青所在大队的李副政委让他总结一大队去年的文化教育工作中总结的七十一本经验汇编，这些正是常青实现写作教学法得以创造性转化的经验基础。

常青在总结经验中发现，工农兵普遍拥有丰富的生活与战斗经验，但这些经验长期以口头形式存在于日常交往中，从未经历书面化的整理与表达。当他们尝试将经验转化为文字时，面临的障碍并非内容匮乏，而是表达机制的缺失。常青在对一百余名学员的深入调查中，将这一困境概括为“三关十怕”：三关：内容关、形式关、字词关。十怕：怕讲究开头、怕讲究结尾、怕讲究结构、怕讲究层次、怕讲究中心突出、怕命题、怕啰嗦、怕讲究体裁、怕讲究短小精悍、怕生字生词[②]。针对“三关十怕”，常青逐步形成了以“我写我”为核心的“速成写作教学法”。其步骤大体为：先解除顾虑，破除“写作神秘”的迷信；继而让学员从自己最熟悉的事情写起，先写自己，再写周围，由近及远，这便是“我写我”，然后再“向外转”，由写自己扩展到写他人、写集体。最后实现巩固提高，由敢写走向会写[③]。从“我写我”到“向外转”等表面上是一条条简单的写作方法，但其深意在于，它把“笔杆子”交回了本人手中。工农兵由被书写的对象变为书写的主体，工农兵自己拿笔，写自己的经验，发自己的声音。写作教学在这里触及的，已经不只是方法，而是写作主体的“再造”。

（三）从方法到“经验”：“常青经验”的命名、宣传与推广

“经验”在共和国初期的文化治理中本就是一个专门的制度范畴，通过总结经验、树立典型、通令推广，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制度模式。命名本身，即制度化的第一道程序。当军区机关将常青“冠名”，并将“速成写作法”加以绑定、汇编[④]，这

① 华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速成写作教学法创造者——常青》，华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编印，1952年，第6页。

②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训练委员会：《介绍常青的写作教学法》，《人民日报》1952年12月6日，第3版。

③ 同注①。

④ 如华北军区训练委员会在内部印发《常青〈速成写作教学法〉的介绍》、华北军区政治部内部印发《速成写作教学法创造者——常青》等内部参考资料都在编印中把常青和教学法结合起来命名。

套方法便从个人身上被抽象出来，成为可移植、可复制的“技能”与“符号”，而这一“符号”同时具有独特性，进一步增强了传播力。方法是技术性的，可以属于个人，但经验则是政治性的，其诞生与推广无不根源于集体。正如吴明在报道中提到：“常青的经验已由第二高级步兵学校逐渐推广到全军了。所有实施常青写作教学法的单位，都证明了这个方法的优越性。”[①] 速成写作法诞生于华北第二高级步兵学校常青教员个人，速成写作法从学校推广到全军已经证明了这一教学法的行之有效。从全军再到全国，在进一步推广“常青速成写作法”的过程中，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可供全国扫盲运动参考的便捷高效的教学体系，尤其是针对工农兵写作提高问题，工农兵写作教学的“常青经验”也随之诞生。

第二步是背书与赋权。1952 年 12 月 6 日，《人民日报》集中刊出《介绍常青的写作教学法》与通讯《揭开工农兵写作之谜——记常青写作教学法的创造经过》[②]，向全国系统介绍这一方法，这便无形中进一步扩大了“速成写作法”的“权威性”与传播面。1952 年 12 月 20 日华北军区给予常青记“特等功”，并且 1953 年在《人民日报》上公开这一表彰[③]，这正是体现了国家功勋体系的确认与背书，并对常青速成写作法进一步“赋权”。

第三步是组织化的复制与推广。常青速成写作教学法的传播并非自然扩散，而是一条组织化的推广链条：从华北军区到全军再到全国各地方。一开始华北军区就在军区内部发行了关于常青速成写作法的介绍资料[④]，后来渐渐传播到全军，李准在河南洛阳干部文化学校教初中语文的过程中，便采用了常青的“速成写作法”进行教学，效果颇丰，学员在学习后所写习作得以在《河南日报》发表，并且周围不少学校要求李准来介绍所使用的这种“速成写作法”[⑤]。1953 年，常青的速成写作法更在军区其他教员的读者来信中获得了直接的肯定：

> 我是某军事干部学校的一个语文教员，在最近一个多月来，尽量采用“常青写作教学法”进行教学。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对语文教学是一个极大的革新，效果非常好，同学们作文有了极大进步。学员张长勇，一九四七年参军，参军前读过三年私塾，一年高小，一年简师，因是在游击区，都没有好好学。去年十月开始学语文，在采用常青写作教学法前，他老感到作文困难，每篇写五六百字，内容空洞，词句不通，在学习常青的办法后，能写近三千字的文章，内容生动，语汇丰富，真象一篇短篇小说。象他这样的人并不少。事实证明，工农干部生活经验丰富，语汇甚多，只要加以启发就可写出极好的文章。从前我改作文老感到不通句子太多、内容枯燥无味；现在每次改作文都象在看小说，其中许多事迹深深地教育了我。[⑥]

又如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政治部编印的《速成写作文选》就把常青的速成写作法学习后的工农兵写作收集起来，并在前言中便提到速成写作法的成绩：

① 吴明：《揭开工农兵写作之谜——记常青写作教学法的创造经过》，《人民日报》1952 年 12 月 6 日，第 3 版。

② 同注①。

③《华北军区政治部通令嘉奖写作教学法创造者常青》，《人民日报》1953 年 1 月 14 日，第 3 版。

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训练委员会：《介绍常青的写作教学法》，内部发行，1952 年。

⑤ 李哲：《李准早年传略补遗——以豫西“地方史”为视点》，《重读李准：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走来》，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23 年，第 103—105 页。

⑥ 钱听涛：《“常青写作教学法”作用大》，《人民日报》1953 年 1 月 21 日，第 2 版。

在半年来的文化学习运动中，由于党和上级的正确领导，由于全体教、学员的积极努力，由于我们运用了祁建华同志创造的速成识字教学法和常青同志创造的速成写作法，在文化战线上获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本小册子就是很好的证明。这本小册子所集的文章，是用“我写我”的方法，写出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这些文章是一些活生生的阶级教育材料。读过这些文章，可以增加我们工农同志的写作信心。①

而在《人民日报》为主的报刊宣传下，各地方也逐渐开始尝试常青速成写作法，山西省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委员会可以说是最早翻印常青速成写作法并运用到当地扫盲工作中去的②，随后不久，山西省人民政府扫盲委员会办公室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阅读写话教学经验介绍》③，一版印数多达20000册，其中最后一部分就是介绍常青的速成写作法。至此，“常青经验”完成了从一个部队课堂到全国工农兵文化教育实践的跨越。

综上所述，“常青经验”是一套写作教学方法论被确立并推广为全国工农兵写作教学的“典型”的文化实践模式，正是在这一模式下，我们或许需要重新看待或再次强调工农兵写作教学的价值：

其一是在军事上可以提高战士理解命令、报告情况与总结经验的能力，直接影响作战与训练效能。

其二是政治方面，通过写作实践，使工农兵得以“翻心”，使得工农兵敢于用自身语言表达立场与情感，强化阶级认同与政治觉悟。

其三是组织方面，大规模的写作实践形成基层表达网络，为政策传播的“如臂使指”与群众动员提供基础。

正是这三重功能的叠加，使写作教学在这一历史阶段获得了超越一般教育活动的制度权重，也是“常青经验”得以全国推广的必然。

二、工农兵“写得出”后怎样：速成的短板与阅读转向

（一）“速成写作法”的短板与边界

常青的“速成写作法”在1952—1953年间受到各地热烈欢迎，但仅仅是在各种内部印行的资料中，属于教员的参考资料的成分更多一些。但对于广大的具有基础识字阅读能力的工农兵，“速成写作法”显然还要进一步传播开来与读者们见面，常青的“速成写作法”先在《学文化》杂志进行过连载，而后在1954年12月，常青的“速成写作法”由工人出版社列入“学文化小丛书”之一种，整理结集出版为《工农兵写作教学的初步经验》。

《工农兵写作教学的初步经验》总共十四章，分别为：

一、“我写我”——“向外转”——闯破内容关

二、用熟悉的话写内心的事——闯破字词关

三、内容第一，步步前进——闯破形式关

四、讲、读、写亲兄弟——互相支援

五、想、说、写三点成一线——想好，说好，一气写成，回头来，仔细修改

六、开开三把锁——怎样“我写我”

七、“随身宝”——细致地写、具体地写

八、节骨眼地方开了花——有重点，重点长、过程短

① 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政治部：《速成写作文选》（第一辑），内部发行，1953年。

② 参见山西省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委员会：《速成写作教学法》（扫盲工作参考资料），内部发行，1952年。

③ 山西省人民政府扫盲委员会办公室：《阅读写话教学经验介绍》，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53年。

九、一条大道，两个路标——怎样“向外转”

十、到处留心，见啥写啥——勤想、勤看、勤记、追根底、找关系

十一、船有码头车有站——排队、分段、列提纲

十二、就事论事——举例作文，“加料、加工”

十三、旧翻新——当自己的老师

十四、养成写作习惯 ①

从书名中或可微妙地感觉到，“常青经验”已被认可为一种“工农兵写作教学”普适化的经验。而从每章的章名可以看到，十四章的标题几乎全部口诀化，便于形象化记诵、传播。尤其是每一章几乎都是工农兵写作教学课堂的“逐字稿”，简明、生动跃然纸上。然而，工农兵写作教学任务重，难度大，情况复杂，自然并非一帆风顺之事，尤其是在扫盲的过程中，“反复”的过程时有发生。早在 1953 年山西扫盲过程中就出现了不少“反复”的情况，扫盲师资的紧缺使得“速成写作法”一度被“否定”而停用，如山西省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史纪言在总结山西扫盲工作中的问题便提到：

留下来进行巩固识字阶段教学的教师都比较弱，使巩固识字阶段的教学陷于半自流状态。另一方面，在一部分巩固识字班中，把巩固识字阶段的教学，看得过于神秘，不知如何下手。如太原机器厂扫除文盲实验班，在进入巩固识字阶段之后，曾采用让学员担任速成识字班的辅导员、让学员运用常青写作法练习写作等办法来巩固学习成绩，但后来又都否定了……实际上这些办法都是可用的。 ②

工农兵“写得出”后怎样？这是事关扫盲成果巩固的核心问题。“写得出”在没有巩固的情况下，随时有着“吃二茬苦，受二遍罪”的危险，因而巩固扫盲成果也是工农兵写作教学的应有之义。常青“速成写作法”虽然一开始卓有成效，但是当然不是“包打天下”的“通解”，作为“速成”的写作教学法，常青“速成写作法”的核心是巩固识字，速成写作，但是能否进一步进行提高，来巩固速成的写作的成果，这恐怕就陷入了“速成”的弊病之中。

在《工农兵写作教学的初步经验》的前言中编者白川便直言常青“速成写作法”的不足：

这本小册子，是根据人民解放军文化教员常青等的写作教学经验写成的。……还要说明的一点就是：这种教学方法，一定要在识字教学的基础打好以后才能采用。因为这一写作教学法，只是工农兵成人初学写作时教学方面的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它不能代替整个的语文教学。如果以为在对成人的语文教学中的任何写作阶段都可以采用，或者以为有了这样的写作方法，所有语文教学问题就可以全部解决，那就不对了。学语文，首先要打好识字基础，还要不断地注意词和句的丰富，不能孤立地去学写作。[3]这是阅读这本小册子时所应当注意的。

从白川的说明中不难看出，“速成写作法”的效用是有着明确的边界的：这种教学方法“一定要在识字教学的基础打好以后才能采用”“它不能代替整个的语文教学”，尤其不能“孤立地去学写作”，还必须不断地“注意词和句的丰富”[4]。这并非常青的自述，而是出版机构（编者）对这一工农兵写作方法边界的自觉声明，可以说在推

① 白川：《工农兵写作教学的初步经验》，北京：工人出版社，1954 年，目录页。

② 史纪言：《山西省扫除文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53 年 2 月 5 日，第 3 版。

③ 原文无下划线，为笔者为表着重后加，后文同。

④ 参见《工农兵写作教学的初步经验》前言页“编者的话”，白川：《工农兵写作教学的初步经验》，前言页。

广经验的同时，也在管理经验，为经验划清边界。速成写作法最为核心的部分是“我写我”，“我写我”将工农兵既有的生活经验直接转换为文字，攻克的主要是“三关”中的“内容关”，赋予工农兵写作初始力，然而“字词关”尤其是“形式关”的真正攻克，速成写作法本身涉及较浅，这是因为词汇、句式、修辞乃至整篇文章的“排兵布阵”，这些无法从既有工农兵的“肉身”经验中直接产出，只能来自被教或自我教学——更多情况下也就是阅读。“我写我”让人“写得出”，却不能自动让工农兵“写得好”，当工农兵把亲身经历写完，写作便难以为继，这时就必须有新的源头来“输血”。

（二）常青的阅读转向：作为“辅助”的《工农兵阅读法》

1953年以后，专门面向工农兵的写作辅导读物开始大量出现。上海北新书局陆续推出“写作辅导丛刊”，后改由四联出版社继续出版；1958年后随着群众文艺运动的不断勃兴，上海还出现了“读书运动辅导丛书”与“群众文艺创作辅导讲座”等系列读物。而江苏文艺出版社则建立起了相当庞大规模的“工农兵写作辅导丛书”体系，其中包含了《谈谈写独幕剧》《大家来繁荣创作》《端正写作态度》《怎样处理写作材料》《创作组怎样活动》《谈谈写小调》《谈谈写诗》等多个门类，每种发行量均在万册以上。这些工农兵写作辅导读物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扫盲运动卓有成效，工农兵群体形成了新的“读者群”，并且在“召唤”与鼓励中，有着丰沛的创作的欲望与冲动。

然而，工农兵写作是需要不断被“辅导”的，这便说明工农兵写作在经由如“常青经验”的训练之后，并没有实现“自循环”，而是需要外源性的辅助来帮助巩固。这批出版物以工农兵为明确读者对象，以实用性为首要原则，它们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工农兵写作教育从组织化训练向社会化正循环普及的转型。工农兵写作不再只是共和国成立之初需要“速成”普及的政治任务，而成为日常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

根据回忆资料，1955年后常青受到相关事件牵连，工作境遇发生变化，此后他转向工农兵阅读法的研究。但是常青并没有把“速成写作法”当作“吃老本”的金科玉律，而是如他一开始的承诺那般，“决不满足于一时的成就”[①]，一直没有放弃对工农兵写作教学的继续研究与完善。在常青即将离开岗位，不得已被迫转业前往“北大荒”之时。他将“速成写作法”之后工农兵写作需要弥补的那块短板，通过“阅读”的辅助，希望将之添补，这就是常青在1958年6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工农兵阅读法》。

不同的背景，工农兵写作的要求也自然发生变化，1958年面临建国十周年献礼，各地掀起了民歌运动与群众文艺创作的高潮。在此时代背景之下，工农兵写作的短板进一步显现，没有阅读的写作是“拍脑门”的写作，工农兵写作急需阅读来进一步提高水平，那么，面向工农兵阅读的方法的总结，尤其是如何通过阅读来提高写作，这既是大跃进的需要，也是工农兵写作教学自然发展的题中之义。

从“写作法”到“阅读法”，常青的转向本身，就是对“普及之后怎么办”的回答。扫盲让工农兵会认字、会写字，也能作一些文，但要写得更好，光有朴素的生活经验已经不够，必须有文化水平的持续提高，但如不能阅读，便无从创作。1958年，此时的常青不再是“常青经验”的代言人或“符号”，常青的“工农兵阅读”的提出更有一种个人反思的意味，尤其是要追求“科学的方法”。这在“多

① 华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速成写作教学法创造者——常青》，华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编印，1952年，第32页。

快好省”的“跃进”的氛围中，似乎显得有些过于保守。但这正是常青在不断的教学中，根据工农兵写作所遇到的实际困难所凝练出来的弥补方案，没有质量，再速成也只能原地踏步。正如在《工农兵阅读法》的前言中，常青提到：

只有热情和决心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科学的方法。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否则就会费了力气收不到良好的效果。[①]

《工农兵阅读法》共十二章，十二章依次为：《初读》《朗读》《说读一致》《边读边想》《说大意，找中心》《学文章作法》《学词句（一）》《学词句（二）》《熟读熟记》《说课文》《写课文》《培养阅读习惯》[②]。相比《工农兵写作教学的初步经验》一书整理的“速成写作法”，在《工农兵阅读法》目录中不难看出，大部分章节都是为了补齐或提高“句法”和“形式”两关，耐人寻味的是，“读写相依”的逻辑在方法内部其实早已埋下，《工农兵写作教学的初步经验》中的第四章就是《讲、读、写亲兄弟——互相支援》，这章开头便提到了阅读的重要性：

“我写我”以后，有些同志走路想文，发梦话还在说文，一心一意的写呀！写。这股劲头，是好的。但是，也有些同志就以为只要单纯地写，就可以写出好文章；而忽视了阅读。说：“阅读是瞎子看电影，白费劲。”是“白水煮萝卜，没味道！”……总是：“头破血流”“麦黄杏熟”像老驴打滚，翻来翻去，翻不过身。时间长了，自己也感到写作疲乏了。[③]

可以看到，“工农兵阅读法”本身是脱胎于“速成写作法”的，并且两者具有同构性。《工农兵阅读法》的起点是让工农兵“读得完”，初读要“跳障碍，插标记，一气读完”[④]，遇到生字先跳过去、画上记号，读完再集中解决。进而要“读得懂”：边读边想，读想结合，既要“读读想想”也要“想想读读”[⑤]。“说大意，找中心”[⑥]，领会文章的中心思想，会识字与会阅读并不是一回事，能流畅阅读并且领会大意、吸取词句，文化水平才能真正提高。再进而是“为我所用”的三章：“学文章作法”以及“学词句”两章都是把阅读直通写作。解决工农兵写作痛点。“阅读法”的最后是读写结合，也就是“说课文”“写课文”两章，通过课文（范文）的阅读来产出表达，提高写作的质量。“阅读法”的最后一章和速成写作法一样，都是将习惯不断制度化。于“速成写作法”而言是养成写作习惯，而于“阅读法”而言就是养成阅读习惯。

从写作法到阅读法，常青一以贯之的是同一条教学论，由易到难，常青将工农兵写作的能力拆成可供教学操作的一级级台阶，让工农兵在写作和阅读的过程中不断拾级而上。从“写得出”到“读得进去”，从培养“作者”到培养“读者”，共和国的大众文化实践在“后扫盲”阶段展开了一场不那么轰轰烈烈却更为持久的基础建设。工农兵写作教学的普及功能或许已经完成，而提高的课题才刚刚开始。

三、成绩何以检验：工农兵写作的制度支撑与历史展开

（一）成绩前提：工农兵写作实践的国家文学制度支撑

“国家权力对于文学的领导权，既是一种国

① 常青：《工农兵阅读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 年，前言第 2 页。

② 参见常青：《工农兵阅读法》，目录页。

③ 白川：《工农兵写作教学的初步经验》，第 13 页。

④ 常青：《工农兵阅读法》，第 1 页。

⑤ 同上书，第 13 页。

⑥ 同上书，第 13 页。

家制度的宏观设计，也是一种体制和机制的结构方式和运作方式；特别是在组织结构和机制运作的实际形态及操作实践上。”[①] 工农兵写作的成绩应当如何检验与评判，首先要考虑其所处的国家文学体制背景。工农兵写作的提高与巩固不仅需要“速成写作法”“阅读法”等教学法的经验指导，更有着“一体化”下国家文学体制的全方位支持与展开，而这套维持工农兵写作稳定性的制度至少体现在如下两个层面：

其一是基层文化机构的建设为工农兵写作提供基本空间场域。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城乡基层大规模推进图书馆、文化馆、俱乐部、广播站等基层文化教育建设，这些机构并非单纯提供娱乐性活动，而是在国家文化建设体系中承担着为普通群众提供阅读材料，组织文化活动，开展业余教育，培养基层文化骨干等功能。这些空间场域为工农兵提供了进一步参与到文学阅读、创作交流、板报写作、文艺表演等群众文艺活动的可能性，使工农兵写作不再只是“扫盲”过后的“一竿子买卖”，为工农兵文艺创作提供可能。

其二是各地群众文艺运动的持续性为工农兵写作提供动力。“十七年”时期，各地区、各系统围绕工农兵创作开展了大量群众性文艺活动。工厂、农村、部队中的文学创作小组，各类业余文学培训班，地方刊物对工农兵来稿的关注，包括通讯员制度，读者来信制度，“乌兰牧骑”制度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初步具备写作能力的工农兵提供了继续创作的出路与动力。这些群众文艺活动虽然在质量上参差不齐，但从制度功能来看，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张覆盖面较广的基层文化网络，使工农兵写作训练的成果能够持续性地转化、提高，而不是随着扫盲的写作课程结束而消散。

从空间和动力这两个角度来看，工农兵写作的社会化，并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而是国家文学乃至文化教育制度在各方面加以支持的结果。正是这些分散于各地的基层文化机构和群众文艺活动，使速成写作训练产生的写作能力获得了延续和发展的根基。

（二）“十七年”时期的工农兵写作教育的“双轨制”

当工农兵（或者是广泛的普通劳动者）进入到文学场域之中，大都以“文学新人”或所谓“素人”的面貌出现。1960 年华中师范学院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②] 便为诸多工农兵“新人”留有一席之地。但这种“文学新人”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

“十七年”时期工农兵写作教育的历史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文学新人”这一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制度逻辑中，“新人”的出现通常意味着新的专业作家进入文学领域。“十七年”时期的工农兵写作教育，实际上包含两个不同层次的目标，第一个层次是在少数具有创作才华的工农兵中发现文学新人，通过专业机构的培养，使他们进入文学创作领域，成为具有工农兵身份背景的专业作家。这一目标是真实存在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尽管有不少质疑和批评）。第二个层次，也是更为广泛更为重要的目标，则是通过写作训练使大量工农兵获得基本文化表达能力，使他们能够参与群众文化生活，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和社会环境中发挥文化作用。这一目标所期待形成的，并不是专业作家，

① 吴俊：《批评史：国家文学和制度规范的视阈——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若干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 年第 6 期。

② 如第二编第三章第一节“群众文艺”，第三编第三章第四节“主要工农兵作家及其作品”，参见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 年，目录页。

而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 文化积极分子 ”。这两个层次在实践中并不是平行的。第二个层次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第一个，也更能代表工农兵写作教育的整体性格。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探索确实是乏善可陈的，与其说重视那些作为“ 无产阶级文艺 ”想象的，处在“ 资 ”“ 无 ”对垒之中的工农兵“ 样本式的作家与作品 ”[①]，倒不如认为这些“ 成绩 ”或“ 标准 ”本身是非体制或本身不被过于期待的“ 副产品 ”。

对于绝大多数参与写作训练的工农兵来说，写作能力的获得，并没有将他们引向职业文学道路，而是使他们成为基层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常青速成写作法后对阅读教育的推进，正是对这种持续提高需求的回应。但这种提高的目的，并不是将所有工农兵都培养成作家，而是使他们成为具有较为完整文化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文化积极分子 ”这一身份因而比“ 文学新人 ”更能准确描述工农兵写作教育的历史产物或成绩。这种身份定位，并非对文学能力不足的迁就，而是共和国初期文化建设目标的内在体现。

（三）工农兵写作教育的目标

1965 年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在“ 十七年 ”时期工农兵写作教育的历史进程中占有特殊位置，可以说，它不是一次普通的文学会议，而是国家对建国以来工农兵写作实践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正式检阅，同时也是对工农兵写作教育整体目标的一次公开确认。相比于 1956 年的第一次“ 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 ”，1965 年的第二次会议采用了“ 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 ”这一表述。这便意味着工农兵写作教育的目标——也即“ 双轨制 ”朝着“ 单轨制 ”确认。文艺价值的“ 事功性 ”[②]达到了“ 十七年 ”时期的顶峰。常青在大跃进时的困惑与思考，对阅读教育的提倡，实际上依旧是本着工农兵写作的“ 业余 ”实践，而非专职作家的培养（何况常青本身也仅仅是一位教员而非职业作家）。正如周扬在大会上所提到：

> 我们的业余的文学创作者，千万不要想着专业化。我们文艺队伍，包括专业和业余两个部分。业余是大量的，专业只能是少量的。将来的发展，是业余愈来愈多。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可能都是业余。[③]

“ 业余 ”和“ 积极分子 ”两个词同时出现，构成了这次大会最重要的身份界定。“ 业余 ”一词，意味着这些创作者并非脱离生产劳动的职业文学工作者。他们来自工厂、农村、部队以及各行业基层单位，文学创作是在本职工作之外进行的文化活动。“ 积极分子 ”一词，则沿用了共和国政治文化中对基层骨干力量的惯常表述，暗示这些人不只是个人的创作爱好者，而是具有一定组织意义的群众文化代表。

这一命名与 1956 年“ 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 ”之间的距离，恰好说明国家在 1965 年对工农兵写作教育目标的定位。它所希望呈现的，并不是一个新的职业作家群体，而是一支长期在基层从事业余文学创作的群众文化力量。这支力量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工厂、农村和部队之中，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工农兵写作教育多年推进之后所形成的社会现实。从会议规模来看，这次大会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余名代表，其中绝大部分的业余创作者大都受到过“ 常青经验 ”的影响（如

① 李旺：《“十七年”文学中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写作》，《理论月刊》2013 年第 1 期。

② 杜英：《重构文艺场域与文艺机制（1949—1956）》，《中国文学研究》2012 年第 2 期。

③ 周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报告、讲话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6 年，第 32 页。

在大会上发言[①]的李准还曾用这一方法教学等）。

这里不妨做一个比喻，正如在医疗领域，赤脚医生的意义不在于他们能否替代专业医生，而在于他们使基层医疗服务成为可能，弥补了专业医疗体系无法覆盖的社会空间。工农兵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与此类似，他们并不替代专业作家，但他们使文学活动进入了专业文学无法抵达的基层社会，使文化建设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成为可能。这种判断，实际上也与“常青经验”最初的制度逻辑形成了呼应。常青速成写作法之所以能够获得“特等功”，正是因为它被认为对整个军队的文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不只是帮助了少数人学会写作。从这一起点出发，经过十余年的历史展开，到1965年时，工农兵写作教育的历史结果已经可以被清晰地看见，其所形成的并不是一个文学史意义上的作家群体，而是一种遍布社会各个层面，真正融入血肉之中的社会主义文化基础。

结语

从1952年常青创造“速成写作法”，到1965年一千余名工农兵“业余”写作“积极分子”代表齐聚一堂。这段历史展开，跨度不过十几年而已，但无形之中完成了一次写作革命。写作的工具性耦合在国家意识形态构建的过程中，尽管在“普及”后十余年的提高中，1965年“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所呈现的各地工农兵文艺实现了相当程度上的提升。在共和国成立之初文盲比例极高、文化资源极度匮乏的社会条件下，通过制度化教学在短时间内实现工农兵大众写作的普及，并在十几年时间内筑牢遍布基层的文艺体系。这本身便是“写作”赋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大文化事件。“常青经验”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为解决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写作教学难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论，更在于它的深层中包含着人民的写作能力既是“天赋人权”，也是作为“国家文化基础设施”的“国家事权”。在当下人工智能赋能创意写作，中文创意写作学科朝着成熟不断先进，“素人写作”如火如荼，“新大众文艺”在互联网条件下飞速发展的当下，人民大众的文化创意与创作活力是否真正得到进一步的解放与提高？在人人可以通过AI来“速成”写作的时候，重新思考作为共和国写作教学史上重大事件的“速成写作法”及“常青经验”，或许对我们今后文化建设与文学写作的价值思考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作者简介：

张宝元（2000—），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202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李准也在大会进行发言，参见《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发言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6年，目录第2页。